

●治史论语

重视和加强对非洲历史的教學和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舒运国

在我国的世界历史教學和研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下文简称非洲)历史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尽管其中有客观和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现状已经很不适应当代非洲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以及中非不断发展的友好关系。因此,重视和加强对非洲历史的教學和研究,已经成为我国世界史工作者迫切和义不容辞的任务。

—

非洲历史在世界历史教學和研究体系中处于边缘化状态,在相当长时间里,这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的现象。在非洲大陆独立之前,西方出版的世界历史,很少涉及非洲,即使谈到非洲,也只是把非洲作为西方文明的被动接受者。在1902~1910年出版的14卷的《剑桥近代史》(阿克顿勋爵主编),是欧洲中心论的样本,全书只记录欧洲历史,甚至连欧洲人在欧洲之外的活动都一概没有。这种情况以后虽然有所改变,比如1957年出版的《新剑桥近代史》(12卷)中,有了非洲史的专门一章;在《剑桥大英帝国史》(8卷)中有一卷专写南非。但是,这些章节的内容无一例外是关于欧洲移民在非洲的活动。又如1935年出版的由C. Hayes, P. Moon和J. Wayland编撰的《世界历史》一书,共49章,而完整叙述非洲的仅一章,名为“对非洲的征服”。书中以“黑暗大陆”为题写道:“直至19世纪末,非洲仍是‘黑暗大陆’。……对于外界而言,非洲的大部分是未知数,尚处于未开发的野蛮状态。非洲的大部分居民是黑肤色,而其中许多人的智力更加低下,因为文明之光还没有照到他们身上。”^[1](p.748)]上述观点代表了西方史学的主流看法,牛津大学教授公开宣布:“也许将来有一些可以讲授的非洲史。但现在还没有,只有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其余的就是黑

暗……而黑暗不能成为历史的主题。”^[2](p.23)]

非洲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上述地位,有其客观和历史的原因:

第一,非洲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因此外界对其了解甚少。

非洲的地理环境比较特殊,大陆东濒印度洋,西临大西洋,由于海岸线平直,少有良港。大陆中部的撒哈拉大沙漠,面积达900多万平方公里,使非洲一分为二。赤道横贯非洲,由于赤道周围的气候原因,形成了面积达60万平方公里的赤道森林带。撒哈拉沙漠炎热少雨,而赤道森林带则是著名的萃萃蝇猖獗地区。可见,从海上登陆非洲比较困难,而走陆路,难度更大。这就造成了非洲长期与世隔绝的状态,与外部世界联系甚少,而外界对其也知之甚少。除了少数阿拉伯地理学家和旅行家的一些记录(如托勒密、伊本·巴图塔和利奥·阿非利加等),直至18世纪末,外界对非洲的了解还只是限于沿海地区,90%以上的内陆还无人知晓。当时的非洲地图上是一片空白,为了使画面充实些,竟然画了大象和黑人人头。

第二,非洲历史上的文字资料较少。

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的作用,在世界进入近代时期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尚处于原始社会的后期,不少部族甚至还没有文字。按照当地的传统,本部族的历史主要通过口述而代代相传。非洲的部族众多,达2000多个,彼此之间的语言又不统一。语言复杂、众多,而又缺少文字记载,这给外界了解和研究非洲历史带来了困难。

第三,殖民主义者的人为歪曲。

西方殖民主义者进入非洲后,始终把当地的黑人作为掠夺、剥削和奴役的对象。为了替他们的殖民主义行径寻找借口,西方殖民者无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客观差别,抹杀非洲黑人创造的历史文

二

明,人为炮制出种族主义理论。在奴隶贸易中,西方奴隶贩子鼓吹黑人“落后、野蛮”,天生低人一等。德国生理学家托马斯·舍梅林振振有词地认为黑人生性“适于充当别人的奴隶”,“能够逆来顺受”;而荷兰医生凯珀更是添油加醋,宣称欧洲白人无论在身体上,或者在智力上,都要胜过黑人一筹。^{[3](pp.692-693)}这些可笑的说法居然成为奴隶贸易的根据,也成为日后种族歧视理论的基础。随着西方列强对非洲殖民侵略和统治的不断扩大,种族主义的理论也同步发展。在南非,布尔人采用拿来主义,把加尔文教义中的“先定论”随手拈来,一并揉入。在欧美,“目的论”泛滥一时,这种理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由某种目的所安排和决定,种族也不例外。上帝在各个种族之间制造了差异,给白人以智慧,使他们能聪明地指挥其它种族的人,给黑人则以强壮的身体和低劣的智力,使他们只能在白人指挥下劳动。19世纪中叶,鼓吹种族主义的宣传物和书籍泛滥一时,其中,英国人卡莱尔(T. Carlyle)、英国爱丁堡解剖学家诺克斯(R. Knox)、法国社会学家阿尔蒂尔(Arthur)和美国海军军官富特(A.H. Foote)的著作特别流行。诺克斯认为,“黑人在能力方面,数世纪以前已经达到了顶峰,所以现在停滞不前了。”富特否认黑人在历史上曾经取得的成就,阿尔蒂尔鼓吹种族的贵贱之分是与生俱来;卡莱尔在《关于黑人种族问题的即兴演说》中,更是肆无忌惮地对黑人说:“去做奴仆吧!这对过去和现在来说,都是全世界的法律。”^{[4](p.20)}种族主义理论变成了杂乱无章的大拼盆。正是这种十分荒谬的理论,成为西方殖民者推行种族歧视和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依据。种族歧视在非洲普遍实施,而在南非则达到了制度化、法律化和合法化的高度。在种族歧视制度下,黑人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成为被排除在社会文明之外的另类。因此,对于非洲的历史,黑格尔都断言黑人是“野性十足、犷悍不羁的自然人”,非洲是“世界上没有历史的一个大陆;”因而“既无变化又无发展。”^{[5](p.328)}

客观原因使得外部世界对非洲的历史缺乏了解,而西方殖民主义的人为扭曲,使得原本就不甚清晰的非洲历史,被蒙上了浓厚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色彩。于是,使世人更加难以了解非洲的真实历史,非洲成为“神秘”、“黑暗”的大陆。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非洲历史教学和研究,所有关于非洲的介绍,仅仅是数十本翻译的通俗读物而已。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大批非洲国家独立后,中非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彼此有了进一步了解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就有意识地介绍非洲大陆和当时蓬勃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非洲,开始系统研究非洲历史。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学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观察、分析和解释非洲历史,注意克服欧洲中心论,批判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理论,因此得出了与西方殖民主义者不同的观点。中国学者认为,非洲具有悠久的历史,而非洲的历史恰恰是非洲人民自己创造的,非洲的历史是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和推动了中国学者对非洲历史的研究,在中国,非洲历史开始恢复其原有的面貌,并作为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而出现在历史教材、报刊和其他书籍上。应该说,这是我国历史研究中的重大进步。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由我国学者撰写的非洲历史方面的著作,如1962年出版的《非洲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1966年间先后出版的七本列国志(阿联、刚果布、加蓬、苏丹、突尼斯、索马里、乍得和加纳)、张铁生先生的《中非交通史初探》(1965年、三联书店)和纳忠先生的《埃及近现代简史》(1963年、三联书店)据统计,约十多种。其中张铁生先生和纳忠先生的专著是国内非洲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反映了当时中国非洲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但是,受到当时国内、外环境的限制,中非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关系,因此在中国的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体系中,紧跟政治形势,非洲历史也相应表现为单一的政治史。大学教材反映了当时的研究状况,近代史只是介绍非洲反对西方殖民入侵和统治的斗争,现代史则阐述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非洲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其中包括对于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没有深入涉及,或者只是根据政治需要而进行一般的分析。于是,通过大学的通史教材,留下的是不甚完整的印象,而无法得到非洲历史发展的全部面貌。例如,我国于1962年出版的《世界通史》(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近代二卷共三十一章,涉及非洲的仅二章(第十九章:1640~1870年的非洲;第二十四章:资本主义国家瓜分非洲和非洲各族人民反殖民侵略的斗争),内容基本上局限于西方殖民主义

的入侵和非洲各族的反抗斗争。

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非洲历史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介绍和深入的研究?

第一,由于两极格局的制约,中非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冷战时期。在很长时间里,国际关系通常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标准进行衡量,政治色彩十分浓重。在这种形势下,中非关系也必然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制约,政治关系成为主要内容。1950年代,中非关系主要表现为新中国对非洲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例如1950年代支持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支持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以及支持刚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等。进入1960年代大批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后,中非关系又主要表现为中国支持新生非洲国家巩固政权和联合反帝反霸的斗争。尽管中非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往不断增加,但是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而且其中折射出来的政治色彩也十分明显。毫无疑问,中非关系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当时研究和介绍非洲历史的重心必然主要落在政治领域。

第二,受到苏联世界历史体系的影响。

新中国在建国之初,全面学习苏联。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在世界历史教学中,这种现象更加明显。究其原因,一是主观上中国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比较薄弱,解放后这种情况没有迅速的改观;二是客观上受到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于是,中国在世界历史教学领域仿效苏联,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偏重政治史。这也造成了非洲史过于简单化的状态。

以上的世界历史体系延续了很长时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我国非洲史学者开始尝试编写系统介绍非洲历史的教材,如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编写的《非洲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杨人(木便)先生的《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和陆庭恩、艾周昌合著的《非洲史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等,为非洲历史的教学提供一些系统而又比较基础的材料,但是非洲历史受到忽视的基本状况没有根本的改观:

首先,在新编的世界历史教材中,非洲历史所占的份额依然特别小。以高校比较通用的几本教材为例,王荣堂、姜德昌主编的《世界近代史》(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共29章,涉及非洲仅一章(近代非洲

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共20章,而非洲历史的内容仅仅是第十九章中的一节(非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其他的世界通史类教材也大致如此。

其次,在全国高等院校历史系的教学中,学生主要通过世界通史来了解和学习非洲历史。能够开设专门的非洲史课程(通常是选修课)的学校十分稀少,据了解,全国仅有十几所。非洲史课程的教材,大多采用陆庭恩和艾周昌先生编撰的《非洲史教程》,这本教程是老一辈非洲史专家的力作,至今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这本书毕竟已经出版20余年,已经不能反映近年来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撰写或者修订《非洲史教程》,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然而,这项工作又远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再次,在各类科研立项中,非洲史的项目少而又少。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例,1993-1998年,共计立项61项(包括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 and 青年项目),专门的非洲史研究仅1项;1999-2009年,总计立项(不包括后期资助项目)194项,非洲史研究依然只占1项。至于教育部和地方项目,情况也基本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剖析非洲历史,推翻了西方殖民主义观点,使非洲历史在世界历史中有了应有的地位。然而,由于当时国内、外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非洲史的研究和教学表现出过于简单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延续了很长时间,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

三

如果说,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那么,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改变这种状态:

第一,非洲在世界舞台上的迅速崛起,要求世界了解非洲。在政治上,非洲国家独立后,在联合国占有近1/3席位,在不结盟运动中占有一半江山;在经济上,非洲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世人越来越清楚认识到,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无法离开非洲。为此,世界应该深入和全面了解非洲。

第二,中非关系的不断推进,要求中国人民进一步了解非洲。但是,我国学术界对非洲历史研究,已经远远赶不上中非关系发展的速度。第四届中非论坛的召开,使中非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快速发

展,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新高度。中非高层领导互访频繁,中国大批企业赴非洲投资创业。相比之下,中国对非洲的研究却显得不够。从现实的角度上讲,重视非洲历史教学和研究,有利于国人了解非洲,有利于推动中非关系的发展。

应该说,今天我们也基本上具备了加强对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条件:

第一,历史科学的迅速发展,使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日益丰富和有效,这大大推动了非洲历史研究。考古发现、口述史料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应用,使非洲历史的空白点缩小,非洲历史日益完整和丰满。以口述史料为例,它填补了非洲历史上缺少文献记载的空白,非洲独立以后,一些研究非洲历史的学者到各个部族收集口述资料,取得了丰硕成果。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最终恢复了非洲历史的基本轮廓,肯定了非洲人民对世界历史的巨大贡献。十分明显,今天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学术界对非洲历史的研究成果,比较完整和正确地阐述非洲历史。

第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学者对非洲历史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自1950年代末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历史学界在非洲史的研究和教学中,都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首先,研究领域大大扩展。除了单纯的政治史外,已经涉及到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法律史、华侨史、人口史和环境史等;其次,研究的地区从北非扩大到西非、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再次,研究的深度有明显的进步。在史料的掌握、课题的选择和理论的分析方面,都显示了一定的进展。研究成果——无论是从整体上研究的非洲通史类著作,或者是地区和国别史著作,或者是专题研究的各种著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明显提升。当然,这是一种纵向比较的进步,如果与国际学术界相比,差距仍然十分巨大。但是,这种进步毕竟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第三,文革后,在老一辈专家的带领下,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研究队伍。在人才培养上,也形成了从硕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的

完整体系。北京大学、云南大学、湘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都已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这批包括老、中、青在内的研究人员成为加强对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力资源基础。

第四,出于外交和对外经济工作的需要,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如教育部、商务部和外交部等,在近年来不断要求加强对非研究,这成为推动非洲历史教学的动力。

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强化对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研究,而客观条件也给我们提供了若干有利因素。因此,加强对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为了有效加强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如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应该制定相关政策,加大投入力度,鼓励、支持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比如,在中国社会基金项目和教育社科项目的设置中,给非洲历史的研究以更多的空间;又如,教育部在非洲史学科建设方面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在若干有条件的大学建立非洲史(或者非洲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基地,以此带动非洲史学科的发展。

第二,采取积极、有力措施,培养非洲历史教学和研究队伍的后备力量。当前,已经有若干学校具有培养非洲历史专业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条件,教育部也支持“培养小非洲通”计划。我们应该利用现有的条件,积极推进高校与教育部的合作,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培养计划和措施。

第三,搞好全国范围内协作。由于非洲史的教学和研究人员数量少,而且比较分散,因此如果各自为战,很难完成大项目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非洲史研究会过去有很好的传统和经验,今天也应该有所作为。通过非洲史研究会,可以承接较大的研究项目,组织和协调研究人员,完成国内研究力量的最优化配置,并且产生最优效果。

以上是笔者的一得之见,意在抛砖引玉,引起学界的重视。

注 释:

根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资料统计,见 <http://www.npopss-cn.gov.cn>

参考文献:

[1] C. Hayes, P. Moon and J. Wayland, World History, Columbia, 1935.

-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 [3]吴秉真.非洲奴隶贸易四百年始末[A].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一分册)[C].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 [4]P.O.Esedebe, Pan- Africanism The Idea and Movement 1776~1963, How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 [5]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对一个新社会的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接第137页)

用,使学生在紧张的学习时间里提高了学习的针对性,从而提高了学习的有效性。

4、“模块链接”旨在说明各模块内容的关系。“专题模块”的体例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和通史一样,都有自己的缺陷。历史是复杂的、联系的,许多重要的历史知识要讲清因果关系肯定会涉及到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这样在模块教学中就会出现同一重要历史知识的割裂,使学生在一个模块的学习中很难对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和形成整体认识,从而使每个模块学习只是蜻蜓点水。“模块链接”的设置,加强了三个模块之间的联系,使学生形成对重要历史问题的整体认识,既兼顾了各个历史专题的重点,又兼顾了历史专题的全面。

总之,这些栏目的设置让学生易学,教师好教。

再看正文:关于新教科书的新特点,我个人认为最大的改变不是形式上体例的转变,而是在内容上的实质性调整。而这种调整的成果突出体现在以学生发展为本。

1、删繁就简,减轻负担

课改前,高中历史教课书采用“浓缩”中外通史的写法,把生动有趣的历史变成“压缩饼干”。作为历史知识体系,高中历史教课书是完备的,但它只是一些干巴巴的条文,只有历史知识的基本框架和历史结论,缺少生动具体的史实。而新教课书不惜牺牲历史的连贯性,大量削减知识点主要有两个意图:第一,为教师充实历史课堂内容创造条件;第二,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活动创造条件。削减知识点,学生有了足够的时间去阅读教师根据重要知识点选择的丰富生动的历史内容,削减知识点,也为学生的自主活动和师生互动留出了时间。总之,大量

削减历史知识点,是要让师生共同在具体翔实典型的史实基础上开展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使学生能在这种历史教学的过程中陶冶情操、发展各种学习能力。

2、淡化知识内容的学术性和专业性

将有明显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学色彩的内容如必修一中外法律文献内容、必修二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内容、必修三有关古代中国文学内容,简明扼要地加以历史性的介绍,避免陷入纯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学的技术性叙述,大大降低了学术性和专业性,大大降低了教学的难度。

3、加强教科书的可读性和启发性

在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前提下,做到文字概括精练、叙述相对平实、头绪相对集中、图文并茂,不但方便了学生学习,而且激发了学生学习。当然现在的教科书离内容充实有趣,文字生动流畅,叙述具体形象还有一定的距离,希望在以后的修订中能够得到改善。

历史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把纸上的事件、人名、概念像索引一样复制到人们的大脑中,灌输现成的结论,因为如果这样,将窒息学生想像力的空间和理解的多样性的可能,忽视对学生启发。课改后,教科书正文内容历史结论性的条目少了,资料性、思考性的内容翔实了,史料和现实生活的结合程度高了,加强了教科书的启发性和指导性。

总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历史教科书是学生获得知识、发展能力以及形成健康价值观的主要工具,教科书的内容编排自始至终围绕着学生的学,我们的教科书逐渐体现了这一变革,增强了“学本”的功能,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本。